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ZhongGuo XianDaiShi TanSuo

# 中国现代史探索

郭大钧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XianDaiShi TanSuo

# 中国现代史探索

郭大钧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史探索 / 郭大钧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0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7378-5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  
IV. ①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9984 号

---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7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

策划编辑: 刘松弢

责任编辑: 王 强 刘松弢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4年3月

## 目 录

## 上 篇

简论 1927—1931 年的中日关系 .....	3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	17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43
评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 .....	80
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述评 .....	98
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	134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战区受降纪实 .....	147

## 下 篇

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范围、任务、方法和中国现代史的体系、特点、教育 作用 .....	30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成熟 .....	330
如何评价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 .....	394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	409
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425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探索的历程 .....	443
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 .....	456
后 记 .....	469

# 上 篇







## 简论 1927—1931 年的中日关系

本文试图探讨 1927—1931 年中日关系演变的轨迹，发现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性，揭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 一

从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起，日本的侵略魔爪就伸进了我国东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机将其势力伸张至整个中国，形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大战结束后，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新的世界格局。华盛顿会议上九国公约的签订，打破了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状态，使中国又回复到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又开始了新的争夺。在各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支持下，中国各派军阀势力争权夺利，混战不已，最后形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势力统治中国，分踞各主要省区的局面。1926 年 7 月从广东出发的北伐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消灭了吴、孙两大军阀的主力部队，向长江流域推进。长江中下游是英国在华势力范围的中心区域，英国受到的冲击最大。因此，英国准备采取大规模武装干涉的行动，这是硬的一手。1927 年 3 月 24 日，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制造了南京惨案。而日本主要是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它在华的权益主要在东北三省，因此它的对华政策更多地采取软的一手。

1924 年，币原喜重郎出任日本外相。为适应华盛顿体系的新格局，币原主张“国际协调主义”，推行“协商外交”，与英、美等国“保持协调”，“对华政策贯彻不干涉内政”。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权益是币原外交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而同英、美“保持协调”和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则是为了更有效地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币原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是由于日本当时处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在与各国经济竞争中又处于优势

地位，同时也因为前一时期采取露骨的干涉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币原认为“不干涉政策”是一种维护日本“正当权益”的“最好政策”，而且这种“不干涉政策”是有限度的，如果日本在“满蒙”的所谓“权力和利益”，受到“侵犯”，他就要诉诸一切“正当手段”加以维护。这就是币原外交对华政策的本质特征。1926年年底，币原派佐分利贞男到汉口、南昌，分别会晤陈友仁和蒋介石。币原得知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正在分裂，“革命军内部蒋派与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币原认定蒋介石是“稳健派”，随即向若槻内阁建议拉住蒋介石，利用他去压制共产党。

蒋介石于1927年1月由武汉回到南昌后，即积极寻求日本对他的支持。他向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表示：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承认外国借款，并且如期偿还；保护外国人投资的企业。<sup>①</sup>他还在庐山向日本海相派来的小室敬二郎表示：他没有受苏俄的利用和指导；没有想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他也认为“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他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指币原1927年1月18日在日本第52届国会上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说），并“愿意同日本握手”。<sup>②</sup>为了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蒋派戴季陶去日本，向日本朝野说明蒋的态度。蒋又派黄郛去武汉访问日本领事高尾亨。2月初，黄郛在汉口会见了日本军部派来的铃木贞一。随后铃木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陆相宇垣一成的意见，即军部希望蒋介石“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国民运动”。蒋当即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他“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sup>③</sup>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时，日本军舰没有开炮。惨案发生当晚，蒋介石由安庆到达芜湖。他派员到日本驻芜湖领事馆向代理领事藤村表示：南京事件由他负责处理，希望日本出面调停，并转告英、美当局停止炮击。当他得知有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馆员逗留在芜湖时，又于深夜派人转告说：“蒋

① 见日本外务省亚洲局：《最近中国诸问题概要》，卷2，1927。

② 《英驻日大使蒂雷向外交大臣张伯伦通报蒋介石与小室的谈话记录》，见英国外交部《中国机密通讯》，F2664/2/10。

③ 见铃木贞一等：《土肥原贤二秘录》，196页。

介石决定亲自前往南京以解决事件”。<sup>①</sup> 3月25日午，蒋介石乘楚同舰到达南京下关。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秉承蒋的旨意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向领事森冈正平表示：对这次事件感到遗憾，善后问题愿以真心诚意谈判解决。希望日本方面务必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杨杰随后派兵护送135名日侨登上日舰。森冈即将这些情况电告币原。币原判断中国“稳健派”与“过激派”的分裂即在眼前，目前最好的策略就是利用蒋介石打击共产党，以扑灭中国革命。蒋介石26日到达上海。币原令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迅速与蒋建立联系。27日矢田会见黄郛，要求为与蒋之会见做出安排。30日蒋接见矢田，对日本没有参与炮击南京表示感谢，并说这使人看出“日本对华外交是与英美的压迫政策相分离而独立的，相信会有好影响”。矢田告以英、美、法都在谋划对中国增兵，“当前实处在千钧一发的严重关头，可以说危机四伏，些微细故便会激成大事件”。蒋当即表示充分了解矢田的意思，“必当采取严厉制裁措施”。<sup>②</sup> 31日，蒋向报界宣布：关于南京事件，“对外国人一定有相当满意的办法”。至于收回租界，“我不主张用武力及暴动出之”，“各友邦侨民可以放心”。<sup>③</sup> 但这时英、美、法三国仍坚持实行武力制裁。币原得悉英、美、法提出的武力制裁措施后，立即约见英、美驻日大使，向他们提出：目前“蒋介石处境十分困难”，“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企图诉诸武力”，就可能使蒋介石“像武汉共产党所期待的那样垮台”，可能使他“更难以维持长江以南的秩序，无政府状态也将更为严重”。而诱使蒋介石主动迅速解决南京事件，“就可以避免蒋介石和列强都落入共产党阴谋的圈套”。<sup>④</sup> 币原还告诉英使蒂雷：黄郛向矢田透露了蒋介石的抱负是效法土耳其总统凯末尔，他也将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币原并训令驻华公使芳泽，要他反对在抗议通牒上使用“限时答复”的

<sup>①</sup> 《藤村代领事致币原外务大臣》，71号（1927-3-25，芜湖），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6。

<sup>②</sup> 《矢田致币原》，398号（1927-3-30，上海），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sup>③</sup> 《蒋介石关于外交方针的谈话》（1927-3-31），见《蒋介石言论集》，1927。

<sup>④</sup>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2卷，171，1927。

字样。<sup>①</sup>在此情况下，英、美才赞同日本政府的看法。蒋介石在摸准了帝国主义各国的“底”后，下定决心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币原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与币原“维护正当权益”的原则是自相矛盾的。币原无法使“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与维护日本权益的原则并行不悖。币原既以维护日本权益优先一切，“不干涉中国内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币原根本无法提出合理的办法以解决所谓“满蒙”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币原外交的有效性受到内外的严厉责难而陷入困境。1927年3月，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日本军部和在野党抓住时机攻击现任内阁，指责“今日之危机乃现内阁内政外交失败之结果”。南京事件后，批判币原外交的舆论迅速高涨。4月17日，若槻内阁总辞职，币原外交暂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田中“积极对华外交”。

## 二

1927年4月20日，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登台组阁。为确立和推行“积极对华政策”，田中亲自兼任外相，并配以政友会对华强硬论者森恪为外务政务次官，掌握外交实权。田中“积极对华外交”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田中本人就是个“将满洲与中国本土分离”论者。在倒阁过程中的4月16日，田中作为政友会总裁在该党总务会上演说，批判币原对第二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事件的对策，对“发生在我帝国特殊地区满洲的动乱”，态度“极为冷淡”。他认为“满洲”是日本具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地区。4月22日，田中发表施政方针，已表明他要改变币原外交，担负起全面更新对华外交的使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5月1日分三路渡江“北伐”。16日占领徐州。在对外方面继续亲日外交，蒋介石派蒋方震去东京活动。蒋方震声称“此来使命为在日本政府与宁政府间获得一种谅解，即希望日本政府对蒋

<sup>①</sup> 《币原大臣致芳泽公使》，154号（1927-3-28），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介石反抗武汉共产分子活动，与以精神上助力”。<sup>①</sup> 田中指示坂西利八郎根据他的旨意与蒋方震联络。田中的想法是：要求张作霖同意他们之间成为悬案的“满蒙”问题以条约形式予以保障，如果“国民革命”波及“满蒙”，则使蒋介石照样承认这个条约。日本承认中国“统一”，“国民政府”则须承认张作霖在东三省的统治。接着日本参谋本部第二(情报)部长松井石根也来中国“视察”，并会晤蒋介石，探知底细。田中意在促成“蒋张合作”，以排挤英美势力，独霸中国。但是，张作霖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动摇了他在北方的统治。为了阻止南军进入华北，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建议：“张作霖如被打败，则东北便失去安定。因此，在日本而言，宜和列强共同占领津浦、京汉、胶济等铁路，对南北两军加以干涉，促成停战”。<sup>②</sup> 田中采纳了这个建议。5月24日，田中内阁做出出兵山东的决定，公开撕下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虚伪面具。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这次会议是要宣示田中内阁新的“积极对华”政策，策划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会议最后一天由田中作《对中国政策纲领》(以下称《纲领》)的训示。田中说：对华基本方针“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于中国本土与满蒙两者，自不得不各异其趣，分别对待”。本此基本方针，田中提出当前的政策纲领主要内容八点。这个“训示”可以说是会议的结论。《纲领》的要害是把所谓“满蒙”与“中国本土”“分别对待”。对于“北伐”，《纲领》提出排斥共产主义，支持国民党“稳健分子”，对“稳健分子”“采取同情之立场，而协助其达成其要求与愿望”，“建立统一政府”，暗示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欢迎之态度”，但这个“统一政府”的范围仅限于“中国本土”(指关内)。而对所谓“满蒙”，日本“不能不加以特殊的考虑”，“亦不能不痛感负有特殊的责任”，“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陷于紊乱，致使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遭侵害之虞时，不问其来自何方，均坚决加以防护”，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sup>③</sup> 以东方会议为标志，日本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6册，1505页。

② 《晨报》，1927-5-12。

③ 《东方会议内幕》，见《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

将“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作为国策最终确定下来，并提上了行动日程。森恪后来赤裸裸地说出了东方会议的罪恶企图。他说：那次会议目的就是“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了‘东方会议’的糖衣。”<sup>①</sup>

东方会议后，日本一面继续出兵山东，阻止蒋介石“北伐”；另一面趁张作霖还掌握北京政权，抓紧时机向张索取“满蒙”权益。田中内阁把推行《满蒙铁路计划》作为实施东方会议决定的突破口。10月15日，张被迫与“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达成密约，即“满蒙新五路协约”。密约议定后，日方又要求改为政府间的正式协定，对张紧追不放，日张冲突日重，矛盾激化。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9月28日赴日寻求支持。11月5日，与田中的会见是最重要的事情。从会见时记录来看，蒋是把田中看做是“自己的前辈”，“以师长相待”，向田中“讨教”，并指望得到田中的支持。田中对蒋表示“当此之际，从大局着眼，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蒋“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期望”，而整顿江南，除蒋“以外不复再有他人可当此任”，“日本对此必将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且田中对蒋“统一”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限于“统一南方”。田中表白“日本绝对没有支持过张作霖”，“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对此蒋说：“两国的利害是一致的”，“中国之所以排日，乃是认为日本帮助张作霖才引起的”。所以日本有必要帮助他“早日完成革命”，“如果真能如此，满蒙问题也便容易解决，排日行动当可绝迹”。田中对蒋的许诺没有首肯。<sup>②</sup>田中企望中国出现南北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他一再提醒蒋“不必过分急于北伐”，要“专心致力于南方一带的统一”，而蒋如果抛弃“北伐”、“统一中国”的旗帜，他将失去国内的支持，也会失去英、美的支持。蒋介石“北伐”“统一中国”的决心与日本侵华“分离满蒙”的野心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对蒋的亲日外交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蒋访日回国后，

<sup>①</sup> 转引自常城等：《现代东北史》，114页。

<sup>②</sup>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

与宋美龄结婚，开始调整他的外交政策。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重新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17日蒋发表宣言，重申废除不平等条约“应以和平的方法”，与缔约各国“分别进行缔结新约之谈判”。<sup>①</sup>2月10日，“国民政府”特任黄郛为外交部长。22日黄郛宣布外交方针六点，“切盼于最短期内与各友邦开始商订新约”，“对于重要悬案国民政府准备适当时期以公平及互谅之精神设法解决。”<sup>②</sup>3月和8月，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与美、英达成解决“宁案”的协议。“宁案”的解决标志着蒋介石南京政权已经和英、美“和解”，调整了关系。7月25日，中美又签订《整理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11月3日，美国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12月英、法也先后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随之“国民政府”在国联也取得合法地位。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冯、阎、桂四派新军阀取得暂时妥协，开始“二次北伐”。蒋介石在从日本回到上海与新闻记者会见时说：“我们不能忽视日本在满洲的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并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sup>③</sup>3月5日黄郛谈外交方针，表示希望日本“一改从前策略”，不要援助奉张，不出兵，勿阻碍北伐军事行动。<sup>④</sup>6日蒋介石在南京设宴招待日本新闻记者代表团并发表长篇演讲。他说：这次北伐，作战区域仅限于黄河流域，非东三省。<sup>⑤</sup>4月17日，田中内阁决定再次出兵山东。5月1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攻克济南。2日蒋介石抵济南。3日日本军队制造了济南惨案。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护侨为名阻止蒋介石军队向关外发展而敲起的一次警钟。当蒋介石接到中日冲突的报告后，立即命令“北伐军”各师长“各自约束部队，无令不许外出，避免与日本军队冲突”。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与日本决裂，“对抗抗战”；一是“忍耐一时，避免冲突”。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蒋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心

① 《民国日报》，1928-1-26。

② 《民国日报》，1928-2-23。

③ 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148页。

④ 《民国日报》，1928-3-6。

⑤ 见《革命文献》，第18辑，23页。



选择后一条路。4日晚蒋密令部队绕道济南，渡过黄河，继续“北伐”。

田中内阁在制造济南惨案阻蒋“北伐”的同时，又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署“满蒙新五路协约”。日本出兵阻蒋，给奉张以幻想，张作霖对此“大为快意”，仍想“借日武力，留在北京”。因此，在5月7日张表示同意正式签署“协约”。奉张认为，他如此屈从日本，定能取得日本支持。因此决定留在关内，在京津一带与“北伐军”决战。但日本担心战火波及东北。田中内阁连日开会研究对策。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17日晚，日使芳泽访张作霖，劝其撤到关外，张作霖听后不悦。18日，日本政府又以“觉书”分致北京军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声称“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sup>①</sup>与发出上项警告的同时，田中内阁还向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进驻奉天的命令。事实上在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后，蒋介石已在谋划用政治手段“和平接收”京津地区。最终议定奉军撤离北京，退往榆关，“由其将领自行整理”，“国民革命军”不进行追击。在此情况下，张作霖决定离京返奉。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企图挑起军事冲突，乘机占领东北，实现东方会议“分离满蒙”的计划。6月8日、12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天津。

皇姑屯事件后，东北政局一片混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6月18日，张学良抵达沈阳，控制住了东北的局面。但张临危受命，形势十分复杂，东北面临多种势力的争夺。张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确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与日本的未来关系。当时有多种方案供张学良选择。张学良不想步其父后尘，与日本合作，充当日本的玩偶。他原则上赞同实现国内统一。但他所选择的统一道路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收编，而是有条件的妥协。他还想以南京“国民政府”做靠山，与日本抗衡。7月1日，张电蒋、冯、阎等表示：“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随即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会谈。7月中旬，双方商定“易帜”于7月22日实行，“易帜”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任命张学

<sup>①</sup> 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116页。